

普實克與「他的姊妹」——中國

陳相因*

一九〇六年九月十四日，著名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 (Jaroslav Průšek) 出生於布拉格。在中文的學術界裏較少研究者注意到，普實克在捷克查理士大學 (Charles University) 主修的其實是歐洲歷史。一九二八年拿到學士學位後，因他的興趣轉為漢學，才到先後至瑞典哥特堡大學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德國哈勒大學 (Halle University) 和萊比錫大學 (University of Leipzig)，師從高本漢 (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哈龍 (Gustav Haloun, 1898-1951) 和海尼士 (Erich Haenisch, 1880-1966)，但期間並未拿到任何正式的學位。

結束這些歐洲漢學研究的遊學旅程後，普實克一直試圖尋找機會與管道前往中國。恰巧捷克製鞋企業家巴塔 (Tomáš Bat'a, 1876-1932)，也就是現今捷克著名鞋業廠牌 *Bata* 的創始人，亟需懂漢語與漢文化的人才幫助他打開中國鞋業的市場，而設立了中國研究的獎學金。普實克獲得這一筆獎助經費後，在一九三二年抵達中國，至一九三六年離開。普實克在中國這四年期間裏，結識了幾位現代著名的中國及日本作家、學者與藝術家，其中包括了鄭振鐸、郭沫若、冰心、沈從文、徐志摩、丁玲、魯迅、胡適、齊白石、徐悲鴻、長澤規矩也、塩谷溫與其他等人。雖然普實克一開始進入北京大學想學習中國社會歷史，卻因為與這些文人的交往過程裏，對中國的中世紀通俗文化與現代文學產生興趣，始而著手研究。在這些與文人、學者和藝術家交往時的經歷與感想，絕大部分記錄於普實克以捷克語書寫，並在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國，我的姊妹》(*Sestra moje Čína*) 一書裏。這本同時具有自傳性質、旅行見聞和個人觀感的書籍，被不少捷克與斯洛伐克漢學家評為是一本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

有著「優美的紀錄文字與見證時代歷史的」行旅傳記¹。在以捷克語第一版出版後經過將近一甲子的時間，得到臺灣的蔣經國基金會贊助翻譯為英文，方為更多世人所知曉²。在二〇〇五年第一版漢譯本在中國問世，對於想要瞭解普實克個人與東歐漢學研究狀況的中文讀者，在閱讀上更為便利³。

一九三六年離開中國後，普實克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待了一個學期，上了一堂「論中國中世紀通俗文學」的課，這對當時的英美漢學界而言是一個全新的學術領域。然而這一視野從一學期的合約結束，普實克離開美國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後，並沒有得到立即而更深入的鑽研。一九三七年一月回到自己國家的普實克，靠著寫書（包括一本商業中文的教科書，藉以教導 *Bata* 鞋業的員工如何用中文做生意）、翻譯和在布拉格的大學圖書館工作維生。在這一年裏，普實克著手翻譯了魯迅的《吶喊》，並得到魯迅為其翻譯作序。一九四〇年代到一九六〇年代間，普實克也以捷克語翻譯了孔子的《論語》、茅盾的《子夜》、沈復的《浮生六記》、劉鶚的《老殘遊記》、《孫子兵法》、《中國話本小說集》，還有約原著三分之一的《聊齋誌異》，皆在布拉格出版。

一九四〇年代中後期到五〇年代，普實克在捷克斯洛伐克與外國學術界開始嶄露頭角，這段期間他將過去在中國與美國蒐集到關於中國中世紀與晚清通俗文學的資料，進一步深入研究分析，發表了不少篇關於這一新領域的論文，其中大部分被收入於一九七〇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歷史與文學》⁴，該論文集更進一步地讓普實克的名字享譽世界漢學界。一九八〇年李歐梵將普實克研究幾篇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論文集結並翻譯成英文書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⁵，一九八七年出版的《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⁶ 即為此書之中譯

¹ Marian Galik, "Jaroslav Průšek: A Myth and Reality as Seen by His Pupil,"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7 (1998): 151-161, 153.

² Jaroslav Průšek, *My Sister China*, trans. Ivan Vomacka (Prague: The Karolinum Press, 2002).

³ 普實克著，叢林、陳平陵、李梅譯：《中國，我的姊妹》（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5年）。

⁴ Jaroslav Průšek,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Dordrecht: Reidel, 1970).

⁵ Jaroslav Průšek, *The Lyrical and the Epic: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ed. Leo Ou-fan Le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⁶ 普實克著，李燕喬等譯：《普實克中國現代文學論文集》（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年）。

本，他的研究也更進一步為中文學界所識。

讓中文讀者對普實克的生平與學術觀點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於在一九六二年由他主動挑起的一場與夏志清兩人對所謂的「中國文學本質」(the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ture) 的一系列論戰。起因在於普實克發表了一長篇書評，批判夏志清在一九六一年以英文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1917-1957》(*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不夠「客觀」與「科學」⁷。夏志清隨後在同一刊物的下一期也毫不客氣地回擊普實克的批評，遂引發了之後一系列的討論⁸。很可惜的是，一些英美或者是華裔漢學者對於普實克的初步印象與認識，來自於這篇英文書評，對於其過往以捷克語或德語發表的學術著作，往往局限於研究者自身的語言能力而未曾閱讀過，加上對於捷克—斯洛伐克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並不了然。對普實克這種粗略的印象與認識所造成的結果，正如曾經是普實克的學生，也是現職為斯洛伐克科學院比較文學領域的著名漢學家高利克 (Marian Galik) 所云，對普實克為漢學所做出的學術貢獻和成果來說不盡公平⁹。

高利克認為，在批判夏志清的這篇書評裏，普實克失去了他以往所稱頌的節制美德，而致使他在一九六〇年代時受到一些英美漢學家的抨擊。高利克續而指出，普實克之所以對夏志清的著作展開猛烈砲火，多少受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與社會情況的影響，讓他從對殖民主義結束的期望，轉變至對建立新社會主義國家的滿懷希望¹⁰。這裏讀者必須明白的是，蘇聯共產黨自建立蘇維埃政府以來，對國家各機關、社會各階層與世界各國所強力宣傳的科學與機器為全人類帶來美好未來的概念，著實吸引了無數的斯拉夫知識分子。加上二戰時期全歐洲（包括英國）的學術界在國際情勢與政治的籠罩與干擾下，兩極化而選邊站的現象屢見：不是支持法西斯主義，就是選擇共產主義。身在納粹殖民地捷克的普實克，在大戰前後的態度轉向支持共產主義宣傳的新社會，雖然後來命運的發展如高利克所說的，對普氏的理想是一大諷刺，但實際上這樣的發展並不令人感到意外。還有，六〇年

⁷ Jaroslav Průšek, "Basic Problem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 T. Hsia,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Young Pao* 49 (1962): 357-404.

⁸ C. T. Hsia, "On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 Reply to Professor Průšek," *Young Pao* 50 (1963): 428-474.

⁹ Galik, p. 155.

¹⁰ *Ibid.*

代初期甚至以前，就一直深受俄國漢學研究方法與文學理論影響的普實克，追隨著二十世紀斯拉夫文學界所提出一種「借鑑科學以治文學」，而且被普遍認定為較「客觀」的視角和潮流，企圖恢復十八世紀時文學乃為所有學科的顯學的盛況。加上由俄國語言學家雅克布森 (P. O. Якобсон, 1896-1982) 在一九三〇年代領導的「布拉格語言學派」理論當中，有不少借鑑科學方法來分析文本語言，在二戰後的捷克—斯洛伐克學術圈裏仍具重要的影響力。普實克研究魯迅作品時不少部分沿用俄蘇東方學者——如帕茲德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 1908-1974)、索羅金 (В. Ф. Сорокин, 1927-)、彼得洛夫 (В. В. Петров, 1929-1987) 和謝曼諾夫 (В. И. Семанов, 1933-)——的研究視角與方法論。上述種種內外因素連結著捷克與俄蘇兩國的思想體系與意識型態，都是瞭解普實克治學方法論的演變，以及為何他一轉過去溫和節制的態度，而對夏志清研究提出強烈質疑的首先必備知識。

普實克在評論夏志清一文裏，洋洋灑灑的四十七頁中就有近二十頁是在為魯迅不平，強調書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且令他不滿的分析，即在於夏對魯迅的作品過於低估與貶抑，不但誤讀了作者創作的原意，還過度地解釋作品裏的象徵意義。夏志清在回覆普實克一文時，也特別針對了魯迅這一部分回敬了好幾記回馬槍。其實如果夏志清在當時有機會先閱讀普實克的《中國，我的姊妹》一書，瞭解普實克為何在眾多中國現代作家中特別鍾情魯迅的原因，並非出自於他在當時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裏，而是源於他在三〇年代時曾以一位外來的旁觀者，自認「客觀地」觀察中國社會現象所做出的評價。那麼，夏志清對於普實克的回答不至於如其文基調所顯的失望、不服與尖酸。相互瞭解對方所云、為何而評與憑何來判，夏與普兩者的對話或許更能落實在同一平臺裏。憑藉普實克這本行旅傳記可以推論而理解，對於一個熱切地亟欲瞭解中國的外來者，或是處於「客觀的」觀察家的地位，或許再也沒有比一位中國作家能夠「在自己的作品中，寥寥數筆便描繪出社會的淒涼與悲慘」，「其筆鋒強勁有力又簡明扼要」來得更令普實克激賞了¹¹。

至於夏志清在回答普實克一文中，埋怨普氏對他書裏著墨甚多且費盡心力評論張愛玲與錢鍾書的文學成就完全置之不理，絕大部分是因夏先生在當時缺乏管道去明白，普實克與捷克漢學界對於這兩位作家的作品和資訊蒐羅得不夠，故無法也無

¹¹ Jaroslav Průšek, *My Sister China*, trans. Ivan Vomacka, p. 403. 中譯可參考普實克著，叢林、陳平陵、李梅譯：《中國，我的姊妹》，頁 370。

從評起。這些都可以從《中國，我的姊妹》一書看出線索與端倪。由此可見，普實克所謂的「客觀」，實際上或多或少有主體的干涉與建構的成分存在。儘管如此，高利克在評論普實克的研究成果時，認為他最好的論點並不在對夏志清的文學批評裏，而在其他文章中，故理解普實克的思想時切不可偏概全¹²。

一九六八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發生了舉世震驚的《布拉格之春》事件，直接影響了東歐漢學研究。從一九五二年開始普實克執掌的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東方研究所也直接受此事件牽連，普實克被迫離職（亦有一說，說他是憤而離職），以往從事的教學與學術活動都被禁止，生活困頓。一九七二年後，他連想探訪東方研究所其他同事的機會都被剝奪。一九八〇年四月七日與世長辭。在四月十四日的喪禮上，他的門生最後為他朗讀《莊子》內篇第六的〈大宗師〉，將他尊為捷克斯洛伐克漢學界的一派宗師¹³。

二〇〇二年與二〇〇五年分別出版的第一版英譯本 *My Sister China* 與中譯本的《中國，我的姊妹》一書，顧書名思其義，即是一位身為男性的捷克人，把對中國的熱愛視為是一種對自家姊妹的情感。書中諸多內容有助於我們瞭解普實克的為人性、研究動機、學術考量與思想體系的形成。他對中國的情感，具有多種情緒交錯混合的複雜組合性質，隨著不同的時空演變，有著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書的一開始，作者描述自己穿越蘇伊士海峽，繞印度到錫蘭再抵香港的這一段旅程，心中的熱切與盼望猶如去見未曾謀面的親姊妹。抵中國後，並和各地中國人相處一段時間，這種情感又蛻變成一種像與姊妹相處久了的一般，有時見其不合理而冷靜批判，有時為其命運可憐而溫柔憐憫，有時論其不可理喻而刻薄嘲笑，有時望其宏偉成就而心生崇拜。最後，在離去時，作者在描寫外在環境與自身情感時，卻又顯得無限惆悵而感傷。上述這些情感組合變化的體認，正是普實克將書名取為《中國，我的姊妹》的主要原因。

上述或其他等等的情緒起伏，隨著普實克在《中國，我的姊妹》一書裏的生花妙筆，可以回到一九三〇年代各地的中國，遙想當年社會文化的情景與那一代人，不論是文人雅士、市井白丁，還是男女老少各階層的精神面貌。旅行中國各地、到日本與美國的見聞與知識，也有作者銳利的比較，例如南與北、移民區與殖民區、

¹² Galik, p. 155.

¹³ *Ibid.*, p. 153.

沿海地帶與內陸地區、農村與城市、滿與漢、中國人與華裔、海外與本土、作家與作家之間，或者是不同的文化社團的觀察剖析。還有對各國人的觀察描繪，像是中國人與俄國人、日本人、朝鮮人，或者是英國人與美國人在文化與性格的異同比較等等，不涉優劣，細微生動。這些比較分析全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儘管今日看來雖不免落了一些人所謂刻板之口實，但卻也不可否認，這些活潑有趣的比較觀點至今仍舊符合當代人的印象與概念，在許多時候反而更深入淺出地勾勒一般學術著作無法看到的視角。

普實克的《中國，我的姊妹》是一本值得再三閱讀的書籍。可以作為閒暇讀書的娛樂，瞭解二十世紀三〇年代的中國與當時一些文人名士的軼事，像是普實克同胡適、魯迅、茅盾、沈從文、冰心、丁玲等一批影響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潮流的知識分子交往的過程與情況，內容豐富。亦可以為文學、文化與歷史研究的文獻參考，並為理解普實克學術思想的一本必備書籍。